



1949年10月1日，我正好满16岁。我与新中国同生日，这是我一生的幸福和荣光！

我出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因此我的父母亲给我取的名字叫瑞生。1931年，我父亲陈正人是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11月7日至20日，他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我母亲彭儒是福建省中共长汀县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父亲因患肺病住在红军医院位于绵江河畔的一座老庙里。母亲也常到这里住。在我母亲生我时，是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伯伯把我接到这个世上来的。这一天，就是1933年10月1日。

我出生后的一年时间里，虽然整个中央苏区周围充满着战争的硝烟，但红都瑞金是平静的。一岁时的我，是一个幸福的幼儿。

但好景不长，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中央苏区危在旦夕。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雩都河北开进。中央红军主力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就这样，父母亲都走了。他们把刚满一岁的我托付给我奶娘抚养。奶娘知道，“天变白了，白狗子来后，日子肯定很艰难。一旦瑞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红军啊！”

我母亲对奶娘说：“大嫂子，部队要转移了，我们带不了这孩子。求求你收下这孩子吧！请你们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父母亲没有钱，只能送给奶娘一点自己节约的粮票，还有给我织的一件小毛衣。母亲流着泪，跟着大部队走了。那时我的母亲，也仅仅21岁。

红军走后，瑞金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家属首当其害。奶娘天天背着我东躲西藏。奶娘居住的那个村子叫潮陂头，几十户人家都姓宋，全是客家人。我吃过许多妇女的乳汁，也吃过许多人家的饭。



□ 陈瑞生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载风雨兼程，70载砥砺前行，党校人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本版即日起开辟“党校人·祖国情”专栏，刊发党校人亲历共和国建设发展光辉历程的见证，抒发党校人的爱国心声，激励党校人牢记初心使命，奋发有为。

我3岁时就开始记事了。那时，我最怕村边的狗叫。狗一叫，就会有白狗子背着枪来抓我。每当白狗子一来，奶娘就叫我爬着木梯子上二楼，躲在一个大米缸里，或者跑到河坝的灌木丛里躲着。幼小的我，总是这样心惊胆战地度过每一天。

奶娘家很穷，吃饭的嘴很多，吃了今天的就没有明天的。在我6岁的时候，养父把我转让给大柏地高丘村一个姓陈的医生家里。我不愿意离开他们，养父和奶娘也舍不得我，但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办法。临走时，我哭得撕心裂肺。奶娘是小脚，走不了远路。是我的奶奶（养父的母亲）送我。她老人家是天足。其实，我从小就同她睡在一个被窝。她对我比对待亲孙子还要亲。奶奶背着我，翻山越岭，朝着那陌生的山村走去。我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奶奶的背上。

到了陈家后，我只读了小学两年书，就辍学了。从9岁起，我就上山砍柴，早晚放牛、喂猪。大一点后，就干农活了，除了不会犁田、耙田外，样样农活都要干。晚上还要做香烟、做鞭炮、浇蜡烛、做金铤银铤、做纸钱，每天累得精疲力竭，身体骨瘦如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极为苦难中度过的。

我天天盼望着红军早日回来，盼望着有朝一日我能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

1949年8月23日，瑞金解放了！

有一天，我做梦一样，看到在高丘村的墙壁上贴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布告》，最后署名：“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人”。村民们看到了这张布告。有的知情人赶快叫我：“瑞生呀！你爸爸陈正人回来了！”我兴奋地泪如泉涌。我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记得是9月中旬，父亲派他警卫连的龙指导员，带着他写的亲笔信到瑞金潮陂头，找到我的养父宋元注。后来，又到第二家找到我。

同我一起乘坐一辆十轮卡车回到南昌的还有刘伯坚的儿子刘豹生、李立三的儿子李新民。我们从瑞金出发，经过兴国县和吉安。那时路况很差，走了三天才到达南昌。

当晚，我就在南昌豫章路3号，看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一身军装，十分英俊。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母亲彭儒是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

父亲知道了我这15年的苦难生活，他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红军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都和你一样经过过这一段苦难生活。这一段苦难经历对于你今后的成长会有好处。你能活着回来就好。你不要忘记苏区的老百姓含辛茹苦地把你抚养大的恩情。你回来后到四野干子弟学校去学习。学好本领，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母亲也对我说：“瑞生，回来就

好。先到省军区医院检查身体，把病治好。将来好好读书，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母亲还订了牛奶让我喝，使我矮小的个子长到了1.70米。

1950年春天，我到汉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子弟学校读小学，作为插班生读二年级，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和我的小妹妹一个班学习。她们都比我小八九岁。

一天，帅孟奇妈妈在校长王长德（谭政夫人）的陪同下，来看望这些从哈尔滨随军南下的部队子弟。当她走到我面前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立即回答她：“陈瑞生。”“多大了？”“16岁。”“读几年级？”我回答她：“二年级。”我羞愧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不要难过。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耽误你们上学了。”王校长对帅妈妈说：“我们正在考虑让这些大龄的孩子跳班或上速成班。”

学校的全部老师和后勤人员都是军人。学校不仅注重对我们进行文化教育，还特别注重对我们进行品德的教育。例如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爱党、国际主义、艰苦朴素、团结互助等革命传统教育。这些启蒙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浓浓的热爱

祖国的情怀，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尽管我已经16岁了，但我还是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后来，我还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学们选我当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获得了“品学兼优”的奖状。我用3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小学6年的学业。

1953年夏，我到了北京，考上了北京师大附中（后改名为北京101中学）。接着，又考入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这个班里，我终于成了年龄最小的一个。同学们选我当了这个班的副班长。班长是张学良的弟弟、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是抗战时期的团职干部。后来，我还被选为全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在这些久经沙场的工农干部面前，我努力做一个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勤务员，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195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得知后，十分高兴。自从我回到他的身边后，他对我关爱有加。父亲在1952年底调到北京，担任第一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我读中学时，他出差到外地也会给我写信，并寄书给我看。他鼓励我好好学习，在政治上要不断进步。他曾在我的一把折叠纸扇子上题写“有志者事竟成”。这6个字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1957年夏，我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并担任了哲学系57级一

永远铭记红三村的革命故事

□ 杨光高静

鲁西南，这是一片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黄土地，人口稠密，地势平坦，即使咆哮的黄河流经这里，也显示出难得的静谧，只有沿河处处可见的高大村台，才令人蓦然忆起河水暴涨决口时的桀骜不驯。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这里就普遍成立了农村党组织，“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深深扎根当地人民心中。这是一片革命的土地，党领导人民群众曾在这里痛击日寇伪顽，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曾在这里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战斗，越走近这片土地就越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曾经弥漫着的战火硝烟，革命先辈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都会让今天的我们发自内心地自我拷问“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从而激励我们更加牢记初心使命，奋勇前行。

红三村名字的由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于鲁西南曹县的刘岗、曹楼、伊庄就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三个村群众基础良好，救国热情高涨，被鲁西南地委、专署、军分区和曹县县委、县政府选作驻地，目前尚存基本完好的刘岗村刘家祠堂就是当年地委、专署的办公地点和军分区指挥部。三个村自然成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首府，被当地军民亲切誉为鲁西南的“小延安”，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堡垒。在这片人口仅有千余户、没有任何高山深壑作掩护的狭小土地上，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被一次次粉碎。

1940年，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包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三个村的人民群众配合不足300人的我党地方武装，与敌人殊死战斗，肩负起保卫根据地首府的重任。在党的领导下，这些世代代与黄土地、黄河水、老黄牛打交道的农民变身成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士，同仇敌忾，敢于牺牲，用鸟铳、棍棒和砍刀英勇抗击数倍于我的日伪敌顽长达4个半月之久，直到我主力部队赶回歼灭敌人。这一斗争的胜

利，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创造了平原地区没有“青纱帐”掩护坚守根据地的范例，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亲笔嘉奖，将其作为模范战例推广。气急败坏的日寇黔驴技穷，最后只好灰溜溜地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将三个村庄圈在一起写上一个“赤”字，再也不敢肆意进犯。红三村这一英雄的名字由此诞生，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以至后来成为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代名词。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三村孕育了以“敢于斗争、无私奉献和军民一心”为主要特征的红色文化。这些黄河滩优秀儿女的英雄事迹被刻入不朽丰碑，供后人景仰和传承。

敢于斗争。受红三村英雄事迹的感召，鲁西南人民踊跃参军打鬼子。据相关史料记载，仅曹县李集一个村就有157人参加八路军，被鲁西南地委评为扩军模范村，所获锦旗现存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村党支部书记崔景先被评为扩军模范。开明人士周姜兰卖掉全部家产资助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全家20余口辗转奔赴抗日前线，被誉为鲁西南“妇女之光”。

无私奉献。时任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长、冀鲁豫第22专署专员红三村人刘齐滨，为了能让奔赴前线杀敌的战士穿上冬衣，先后卖光了家中所有的农具、牲畜、树木和土地。穷凶极恶的敌人纵火烧毁了他的房子，他坚定地说：有国才有家，只要保住国，倾家荡产也值得。我失去的是一个家，但将来我们拥有一个新中国。他毁家纾难的民族大义，激励鼓舞了无数革命战士义无反顾杀敌报国。刘齐滨病逝后，1943年8月，鲁西南地委、专署在曹县西北部设置齐滨县作为纪念。

军民一心。解放战争时期，鲁西南是敌我激烈较量的重要战场，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此及周边地区发起了12次重大战役。鲁西南人民党群一体，军民一心，组建了由700多副担架、2000多名民工组成的支前团，跟随部队奔赴战场，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了许多事

迹感人的支前模范。时任齐滨县委书记的李荣村救伤员、抬担架、运粮食、背弹药，轻伤不下火线，成为鲁西南支前工作的一面旗帜，被冀鲁豫军区通令嘉奖。

红三村的红色文化是发源于鲁西南地区，熔铸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革命文化，体现了丰厚的时代价值。

铭记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使命不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鲁西南共组织支前民工15万人次，运送粮食近5000万斤，仅红三村就有300多名群众献出宝贵生命。新时代我们更要坚守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即使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筑牢党的群众基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鲁西南的“小延安”红三村这一段革命斗争史深刻证明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可以依靠的铜墙铁壁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坚信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坚守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千难万险，靠的是信仰，为的是理想。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辈视死如归，就是因为对理想信念的坚贞不渝。有感于鲁西南人民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刘伯承由衷赞叹：冀鲁豫人民为了胜利，努力支前，不怕牺牲，十分难得，特致敬佩。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红色记忆

班的班长。我们是家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亲十分高兴。父亲在一次向毛主席汇报时，顺便对主席谈到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情况。主席说：“哲学怎么能从书本上和课堂里学到呢？应该到社会实践中去学，要到工厂去锻炼一段时间，到农村去锻炼一段时间，到部队去锻炼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把哲学学到手。”

在校学习和参加工作期间，我一直遵循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积极地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活动。我当过车工，下过矿井，参加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和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962年夏，我大学毕业，此后十几年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77年7月，我被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被调到中央党校进修部担任副主任和教授工作。我从一个放牛娃到教授，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

回首这些年，我感到虽然尽职尽责地为党和国家效力了，但是谈不上作出过什么重大的贡献。但党和国家却给了我不少荣誉。坦率地讲，我感到惭愧。

所以，我在退休后的近26年中，一直坚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我出版了一些书，例如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少年》，传记文学《井冈山的红杜鹃——我的母亲彭儒》。同时，我还参与写作一些书，例如《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历史大潮中的小脚母亲》《我的父辈》《陈正文文集》。另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中，刊登了几十篇我撰写的各类文章。

目前，我正在撰写一部回忆录《追寻那逝去的难忘时光——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日子》，已写了7万多字。从2017年起，江西省锦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将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少年》改编成40集电视剧《井冈山儿女》，由我担任总策划。现在摄制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愿将此生最后一点余热，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校区综合楼前广场的大型组雕《旗帜》和邓小平全身塑像《总设计师》

张晓光 / 摄

